



宋代的台州,有哪些福利制度

吴世渊 /文

“社会保障”一词,在上世纪30年代,才比较完整地出现在西方社会。

我们说起社会保障,或者社会福利制度的起源,一般认为出现在16至17世纪的欧洲。1601年,英国为解决城市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,出台了《伊丽莎白济贫法》。该法案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障法,英国也被认为是“最早的福利国家”。

那么,中国古代有社会保障制度吗?当然是有的。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济贫法——惠养乞丐法,颁布于北宋熙宁十年(1077)。该法规定,每年十月,各州县派人检查城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,予以登记造册,每人每日支给米豆共一升,10岁以下小几减半。时间是从本年十一月初一开始发放,至来年三月的最后一天停止。这比英国的济贫法,要早了500多年。

北宋的元符元年(1098)、崇宁元年(1102),国家先后颁行“居养法”和“安济法”,规定各地居养院和安济坊,前者收留无家可归的贫民,后者收治贫困病患。

到了南宋绍兴初年,绍兴府和临安府先后出现名为养济院的福利机构,主要收留孤寡老人、残疾人。绍兴十三年(1143),朝廷发布“养济法”,规定养济院要为寡孤独度疾者和乞丐,提供食宿和医疗救助。

这个法,那个法,说到底,就是政府出钱,给弱势群体兜底,并将这一行为制度化。两宋时期,社会福利之发达,不仅远超前代,之后的元明清都不能企及。

台州的福利机构,在南宋嘉定四年(1211)获得大修。当时的台州知州黄雷很关注民政民生,他重修了养济院和漏泽园,新建了安济坊。

养济院,原本在临海资圣寺下,后来重建于中津桥南。新的养济院有20间屋,内设安老坊和慈幼坊——顾名思义,就是养老院和育儿园,既赡养老人、残疾人,也养育孤儿。养济院有田产,每年可收获1700石粮食,再加上政府补贴,可以养活百余口人。

漏泽园,就是公共墓地,家贫无以葬者、客死他乡者,都能在这里安息。漏泽,取自《汉书》,“德泽上昭天,下漏泉”,意思是皇恩浩荡,及于死者。

北宋崇宁三年(1104),朝廷诏令全国,由各州县派遣僧人,对那些暴露在野外的无主尸体进行安葬。台州的漏泽园大概修建于这一时期,位置在临海县东九十里外的法安寺旁,占地三十余亩。

但随着时间推移,埋葬的人越来越多,漏泽园容不下了,四周的围墙也逐渐坍塌。黄雷派人将旧园修葺、扩建一番,又在神威寺、后岭庵旁添置新园,从此“永为邦人聚葬之地焉”。

安济坊,就是福利医院,在台州子城内司理院

附近。从前,那些流浪者生了病,无钱治疗,都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。安济坊建成后,便可安置这些病人,里头日用品、食物、药品等一应俱全。

这些福利机构的运行经费,主要有四种来源:一是户绝财产,就是一户家庭没了法定继承人,那么这户人家的财产,将部分或全部收归国有;二是常平息钱,宋代设有常平仓——一种调节粮价、储粮备荒的粮仓,地方政府往往以常平仓的钱为本钱,投资于放贷业,收取利息;三是个人捐助,一些乐善好施的富人对福利机构进行捐助;四是赃款罚钱,即办案过程中收缴的财物。

福利机构也有一套规范的监督管理制度。地方州县的知州、知县,到乡村的保正长,都要对养济院、安济坊、漏泽园的管理负责。省里的提举常平司、提点刑狱司有权进行监督,并受理老百姓投诉。福利机构内部的管理也很规范。经费出纳有账目,被救助人员的接收、救治,死亡的原因、时间、年龄,以及埋葬时间等,都有详细记录。

宋代的福利制度,实际是一种“损有余而补不足”的社会共济模式——其反映出“抑富济贫”思想和对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实践,与当代的福利主义不谋而合。就像宋代的台州人,生老病死,从摇篮到坟墓,都有政府来管,这就是一个文明社会该有的样子。



一部村志留住乡愁

《殿下志》记录“小村大事”

本报讯(记者陈伟华)一部40万字的《殿下志》,最近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。它生动展现温岭市大溪镇殿下村的发展变迁,记录了该村由贫穷农业村发展为富裕工商业强村的历程。

该志书分19个部分,包括序言、凡例等辅文、概述、大事记、正文、附录、功德榜和后记等。正文分别记录了殿下村的自然环境、政治、人口、经济、文化教育、社会、人物等内容。比如这个村,从土改、互助组、初级社、高级社、人民公社,到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全过程;人口数量、结构变化,姓氏家族历史等;一些重大事件史实真相;生态环境全貌,涉及山、水、池、路、桥、民居等;人才和产业实力,包括古今人物名录及产业发展情况;村史宗谱脉络等等,均有详细记述。

“我生在殿下、长在殿下,这里是我入团和入党的地方。现在我虽然住在椒江,离开故乡有半个世纪了,但我一直很挂念它,也很关注它。2015年春节,时任殿下村党支部书记的赵守云,主持召开了殿下村志编纂筹备会,我受邀参加了这个会议。”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原副书记、《殿下志》主笔林增明说,《殿下志》忠实记述了殿下村的历史沿革、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现状等,其中各主要姓氏家族的历代脉络梳理,可帮助殿下村民和他们的后代子孙,全面系统地了解故乡及本姓氏家族的演变历史,增强地方文化自信。

“村里一旦拆迁,过去的村貌就不存在了。我虽然是个普通的村民,但我总想为这片乡土留下点什么。”副主编赵守正说,编写村志就是希望用纸和笔留住殿下人的集体记忆,记住乡愁。

为了编好这部村志,该村成立了编纂委员会,有50多人参与其中。资料收集、访谈、撰稿、编撰、校对和出版,历经8个寒暑,直至2023年9月,这部志书才基本完稿。在编写过程中,编写组参阅了《大溪镇志》《冠山赵氏宗谱》《太平县志》《台州古旧地图集》等大量文献资料。一些史实记载得不是很详细,编写者们就逐一走访村里的老人,或拜访曾经在殿下生活过的人,向他们求证,尽最大努力真实地还原历史。每每寻访,受访者都能与他们聊上一两个小时,一起追忆过去的生活,抚慰心中的乡愁。

据悉,殿下村的企业户、经商户、村民及社会各界人士,纷纷为《殿下志》的出版慷慨解囊。至2023年8月,该村共有121户捐款,总额达25.8万多元。

(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)



▲五龙山,石夫人峰在此山之巅。

温岭地名里,藏着好多“龙”

黄晓慧 /文/摄

今年是甲辰龙年。龙在十二生肖中位居第五,“龙”意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,中国人被称为“龙的传人”。因此,龙尤为中国人所喜爱,在各地地名中含有大量的带有“龙”字的地名,温岭也不例外,笔者查询中国·国家地名信息库后发现,列入该库的温岭带龙地名有84个(不包括高龙乡、龙门乡等消失的地名)。

根据中国·国家地名信息库及《温岭市地名志》《温岭县地名志》及《太平县古志三种》等诸种方志,笔者梳理了一下温岭的“龙”地名。

在陆地地形类别的地名中,温岭带龙地名有五龙山、九龙山、大龙山、伏龙山、龙岗山、龙鸣山、骑龙岗山、龙王山等。

其中五龙山,《温岭市地名志》载:“明《嘉靖太平县志》载:‘龙山在县东南八里。’山以形名,多峰峦,悬崖壁立,状如五龙昂首,故名五龙山。主峰石夫人峰,海拔185米,亭亭屹立于云表作人形,上戴巨石,若云髻然,俗呼‘石夫人’。北即消山,又称‘消夫人’。宋朝时期已有此名,为市内一大名胜……”温岭新河镇也有一座五龙山,则是北五龙山。清沈文露有《新河杂咏·五龙山》一首咏之:“山势蟠苍青,宛如龙蜿蜒。涛声万壑来,不住三更吼。”

九龙山,《温岭市地名志》载:“清《嘉庆太平县志·叙山》载:‘九龙山在县西南。自梅岭分支,山势一折,群趋南向,状若神龙之赴海。’山因其形得名。位于坞根镇东南与城南镇西北之间……”

大龙山,《温岭市地名志》载:“因岗似龙得名。位于温岭镇中北部,桐山东部。”

伏龙山,《温岭市地名志》载:“清《嘉庆太平县志·叙山》载:‘伏龙山,在松门旧卫城,一名崇宝山。城围九里,东北跨山而筑,横长如伏龙。’因沿山筑城形似伏龙得名。位于松门集镇东北部,东北西南走向……”

龙岗山,《温岭市地名志》载:“因其诸山岗盘亘,向有九龙会聚之说,故名。位于太平街道西南部,海拔497.2米。其上有1972年建的龙岗林场,松林280余亩,间有少量松柏。1978年设温岭电视差转台于顶巅。”

龙鸣山,《温岭市地名志》载:“清《嘉庆太平县志·叙山》载:‘龙鸣山,在县西四十里。上有龙湫,居人往往闻龙鸣,故名。其尖高耸,俗号美人尖(今名百花尖,海拔335米)。登之,江海一览中。’位于温岭镇东部。”

骑龙岗山即温岭大溪的金山,《嘉靖太平县志·地輿上》载:“金山,在王城山西稍北,上锐下阔,宛若金字,宋侍郎王居安作堂面之,号金山堂。”

龙王山,位于温岭松门岛南端,因古时山上有古刹龙王宫,故名。

在南嵩岩景区中,还有一处名胜龙劈门(也有写为龙攀门的),《温岭市地名志》载:“南嵩岩位于大溪镇东南方山东南侧部溪境,温岭至大溪公路经其山麓。以龙劈门、龙劈峡、嵩岩讲寺为主要景点,面积3.86平方千米,属方山—南嵩岩景区。系火山岩劈理地貌,断层交错,地势陡峭,奇峰突兀,怪石嵯峨,峰峦起伏。一条狭长沟谷的两侧山坡呈陡崖峭壁,因受断裂切割破碎及流水下切,形成岩壁上的凹槽,传为龙所穿。”

陆地水系地名有位于温岭市温岭镇的龙鸣溪和洋国镇的龙井河。

龙鸣溪,因源自龙鸣山得名。在温岭镇南部,水出孟家岙,北至温岭镇街区,于温岭下街河头入西月河至江厦大港。龙井河即徐松河,“上跨龙井桥,河以桥名”。桥伍村在龙井河两岸,当地有龙井池,当地《龙井鲍氏宗谱》将鲍正行列为第一世,《龙井先生(即鲍正行)传》有白龙传说。

海域地名中,则有龙攻礁、龙门长礁、白龙头、下龙珠礁、上龙珠礁、龙门鸡冠岙、外龙眼礁、内龙眼礁、钓浜龙珠礁等。这些岛礁中,在石塘、松门两镇,有的原来还是无名岛,2010年时才被省政府公布命名,如龙攻礁、龙门长礁。白龙头“系三蒜岛南部向西南延伸之山体,长约550米,基部宽约400米,面积约20万平方米”,“因其端部有一溜白灰石岩层,远观若带,传为白龙游迹得名”。上龙珠礁,“因上有突出岩体,宛如龙眼,又因南有相似的小礁名‘外龙眼礁’,较之更近大陆得名。别名龙眼礁、上礁”。而下龙眼礁则别名下童。

温岭有三座水库,是带有龙潭二字的,如龙潭坑水库,位于城南镇后里村,在古寺治平寺附近。白龙潭水库,位于箬横镇晋番里村,2023年8月23日正式投用。乌龙潭水库,在城南镇照谷村,以所在地乌龙潭命名,又在照谷村境内,曾改名为照谷水库。

温岭带“龙”字的村名也有多个,如箬横镇龙岗村、龙王官村、街龙头村、城南镇龙潭村、坞根镇迴龙村等,除了街龙头村、龙王官村,其余三个都是近年新增的。

龙岗村由原石岩头村、毛家洋村、应宅村三村合并而成,因辖区地处石龙岗脚下,故名。龙潭村是2018年8月时由原东辽村、沿坑村合并而成,因当地有龙潭

坑(有寒坑龙潭风景区),故名。迴龙村是2018年8月时由原西里村、寺基村合并而成,因当地有两条迴龙溪(溪边建有迴龙宫),故名。龙王官村,因其地古时有龙王庙,故名。街龙头,清《嘉庆太平县志·坊市》载:“街弄头市,在四都,一、七、日市。”温岭市文广新局(当时局名)编的《温岭民间文学》一书,收入了箬横镇龙头村(原属高龙乡)曾任箬横中学校长的退休教师陈人斋讲述、记录的一篇《告龙 解龙》,文中称,高龙(乡),古称“告龙”,街龙头(村)原称“解龙头”。而之所以称之为“告龙”,是因为有陈公告龙的故事。

乡名中流失地名,除了高龙外,还有“龙门”,因龙岛而得名。曾称为龙门人民公社、卫东人民公社。

而流失的旧村名中,带有龙字的村名,有原乌龙岙村、塔龙村等。乌龙岙村2018年8月并入温岭城东街道萧北村,乌龙岙,在清《嘉庆太平县志》中记载:“……北岙夹谷茂林,白径前通,中容四五村落,土人呼胡咙岙。”它又有“护龙岙”之名,民国时当地有县立护龙岙初级小学。原塔龙村,因村委会驻地塔龙头而得名,塔龙头,《温岭县地名志》记载:“传说村西河涧居恶龙,貽害四邻,造塔以镇之,故名。今塔无存。”

四

中国·国家地名信息库所收的温岭的农村居民点地名,带有龙字的地名有25个,如奇龙穴、元龙岙、聚龙堂、灯笼岗、龙头、后龙头、龙王堂、黄坦龙、街龙头、龙坑等。简单介绍其中几个,如奇龙穴,位于温岭市城南镇小东岙村,《温岭市地名志》介绍称:“因其地旧有深潭,传为神龙所居,故名”。奇龙穴是风水学名词,或出于风水之说。此地名,又有据音写为奇龙月、骑龙月、奇龙元等名的。元龙岙在石塘镇新村村,2000年元旦举行新千年曙光节时,这一地名曾广泛传播,据记载,因闽人张元龙居于此岙而得名。聚龙堂在新河镇岙头村,因当地有一聚龙堂而得名。带有龙字,而实际上与龙无关的地名,则是石桥头镇洞桥村的黄坦龙,系“黄坦塍”演变而来。

温岭城镇居民点地名,带有龙字的则有宝龙生活广场、龙誉华庭、锦龙园。交通运输设施地名则有坦龙线、龙岗路、附龙路、松龙路、汇龙路、龙翔路、龙兴路、聚龙路、龙王官路、九龙汇商业街、龙井桥、龙泽桥、金龙桥等。

九龙汇社区居民委员会、九龙湖社区居民委员会、九龙大道、温岭市九龙学校、九龙汇商业街……温岭有不少地名和单位源于“九龙汇”。清《嘉庆太平县志》卷之二上“下保河”一条记载:“在县北五里。沙棘水所出,并承淡口河会横湖之水,北行自双桥达神童门,东行绕渭渚会上阳水,出叶梁桥。地势低洼,易受浸没,其中水道交错,条贯系夥,客舟乍至,往往迷失,摇历数转,仍回故处。自山上望之,盘旋九曲,历历如绘,九龙汇所由名。”九龙汇的形成,有张岳整理的关于九龙争斗的民间传说,收入《中国民间文学集成 浙江省台州地区温岭县故事卷》中。



▲泽国镇的徐松河,当地人称为龙井河。



▲泽国镇桥伍村龙井池。

袁枚诗赞桃源

胡建新 /文

中国古代著名的仙凡相恋故事“刘阮天台遇仙”发生在天台桃源,即天台白鹤镇东北部。桃源是“浙东唐诗之路”上的一颗璀璨明珠。据史料记载,清代袁枚曾三游天台,分别在66岁、76岁和78岁时,他的足迹到过华顶、石梁、万年寺等名胜古迹,写下许多诗篇。当然,他多次到过桃源。

袁枚(1716—1798),字子才,号简斋,晚年又自号仓山居士、随园老人等,浙江钱塘(今杭州)人。曾任江宁知县。中年以后,去职居家,绝意仕宦。他是清代中叶思想解放的文学家之一,同时还是一位旅行家、美食家。袁枚辞官后,除乾隆十七年(1752)曾出山去陕西做官不到一年外,在金陵(今南京)小仓山下的随园差不多住了半个世纪。在此期间,他或往返于江浙,或出游名山。

袁枚既享高寿,又勤著述,所作极富,有《小仓山房诗集》三十九卷、《文集》三十五卷、《外集》八卷、《随园诗话》十六卷、《补遗》十卷、《小仓山房尺牍》十卷,另有文言小说《子不语》(一名《新齐谐》)及杂著《随园随笔》《随园食单》等。

袁枚年轻时就喜欢游学,是一个有趣的性情中人。他在最后的十几年,几乎都在旅途中度过。甚至到了80岁高龄,他还在出游吴越。那么大的年纪,能够承受舟车劳顿,跋山涉水之苦而兴致不减,如此频繁、长时间地出游,其身体状况之佳,精力之矍铄可见一斑。难怪当时有人称赞他“八十精神胜少年,登山足健踏云烟”!

袁枚创作了多首桃源诗作,又搜集历代文人咏桃源的诗作,可以肯定他对桃源情有独钟。《刘阮遇仙文化集成》(西冷印社出版社,2020年1月)中记载:袁枚创作了9首有关桃源的诗歌,他作的《游桃源至会仙石遇雨而返》这首诗中写道“五步一峰转,十步一峰变。重重天堑形,幅幅屏风面。神光果离合,青红遮隐现”,描绘了桃源险峻、清丽、神秘的山水景观,出神入化。

袁枚除了自己创作外,还搜集历代文人咏桃源的诗作加以比较,认为同一题材,通过不同的角度写出,能使人耳目一新。他在《随园诗话》卷八中谈到:王次回的诗,“天台再游刘晨到,那惜千回度石梁”,固然十分深沉,但商宝意却有巧思,“天台已入休嫌暂,犹有终身未到人”,两诗意思相反,但各臻其妙。他自己写的《会仙石》云:“作婿山中仅半年,人间沧海变桑田。教依不敢多时立,生恐归来也惘然!”从第三个角度去写,别有新意。

清乾隆五十七年(1792),袁枚已经76岁高龄了,还精神抖擞地拄杖重游桃源。他的友人唐栝田寄诗给他:“支笻重到水仙家,笑煞桃源洞口花。刘阮有知应艳羨,输公两度吃胡麻。”到了78岁,他三游天台山,80岁,他出游吴越,82岁,寿终。如果他再活几年的话,他定有第四次、第五次,游天台、攀华顶、访桃源。

总之,我们要感恩袁枚为世人留下的桃源美丽诗篇,为桃源遇仙传播起到积极推动作用。